

第7章 “掺沙子”

曾几何时，日本在热烈讨论如何振兴村庄、振兴地区时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年轻人、傻瓜、外来人的参与非常重要。我认为在国外参与合作事业，亦是如此。遗憾的是我已青春不再，不过还有傻瓜、外来人的资格。在国际合作中与当地人保持什么样的距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图：通过走访农村和农民交谈，找出对合作工作的要求和问题。在很多村里结识了很多朋友。（广灵县）

有人认为同化是最理想的办法。努力在衣、食、住等基本生活方面接近当地人。我的师傅石田保昭把这种经验写进他的作品《在印度生活》（岩波新书）。在开始着手绿化合作工作时，我也努力去做了，但是十分辛劳。住在农村时既无浴缸，也无淋浴，不修边幅的我几天不洗澡并不觉得痛苦。在当地，我每天即使能得到点水，也是早晚不洗脸、不刮胡子、不刷牙、不擦身。当地人只用一小杯水就能很好地打发自己。

但是，这样的生活只能坚持一个星期。白天活动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异样，但到晚上钻进被窝后被热炕头一烙，浑身上下痒得无法入睡。于是便逃回有淋浴的县城，休整两三天，然后再去下一个村庄。

按理说我生长在贫穷的农家，从学生时代开始就胡闹，也只有这个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感到吃不消。我算那条道上的落伍者吧。不过，过去的这种尝试至今还很有用。我非常佩服那些能够长期和农民同吃、同住、话能说到一起、心能想到一块儿的人。

当然，仅仅这样还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发现自己的存在价值，做有意义的工作。如果完全同化，变成和当地农民一模一样，那也没有什么意思。在很多人打光棍的农村，年轻姑娘当然受欢迎，像我这样的半拉老头儿，谁要呀。在原本就人口过剩的中国农村再增加一个“中国人”并没有什么意义。

从那时起，我就有意识地将自己作为另类分子做点儿“掺沙子的事。”当地的事情当地人最清楚，我不可能搞明白他们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祁学峰曾说过：“高见不可能搞明白中国农村深层面的东西。”他说得很对，我也不想搞明白。

正因为当地人了解情况，有些事就不会产生更多的疑问。因为关系错综复杂，有很多事情不知道该如何对付。无论哪里都是这样。一旦你确立了一个项目，各种关系就会把你套住，无法脱身。这样，不了解情况、无个人欲望、大脑迟钝也就显现出了它的优势。以第三者

的冷静目光观察、发现问题更有好处。有时可以顽固地坚持己见。

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反作用也很强，自己的价值观会遭到彻底毁灭。我原本的性格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争取把事情做得完美，也可以说是手艺人的性格。但是在这儿的合作事业却把我的价值观打翻在地。总之，广漠的土地，无边无沿。即使想认真地好好干，也无法保证种下的树苗一定能成活。在持续过程中，我感觉脚下在打晃，整个人都要散架了，实在让人痛苦。

说一件我经历过的事。1997年，大同县遇驾山的樟子松开始出现枯萎，原因不明。菌根菌专家小川真先生看了樟子松后，建议“这种现象有可能扩大，最好能呼吁一下”。

我拜访了林业部（现为国家林业局）副部长，谈了上述情况。副部长相当于日本的次官，原本不会见我这种人，是北京的一位朋友给引见的。我的外国人的身份也算帮了一点忙吧。

坐晚上的火车第二天早上到了大同。和往常一样，祁学峰来火车站接我。一见面他劈头就问：“你在北京都干了什么？市林业局已经叫了我好几次了。弄不好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由地开展工作了。”到饭店时林业局局长及其属下的干部表情紧张地等在饭店。看来，我干了一件蠢事，我想。

我在北京反映情况后，林业部给省林业厅打电话过问了此事。

“发生了重大疫情，为什么不报告？”

山西省林业厅又将电话打到市林业局，追问同样的问题。大同市林业局怀疑是与青年联合会合作的日本人向中央汇报的。

看来只有破釜沉舟了。我去市林业局，向他们做了情况说明。中方以局长为首，很多干部参加了会议，省林业厅的副厅长特意从太原赶来参加会议。最初气氛有些紧张，但在交流中气氛逐渐变得融洽起来。

之后，大同市林业局派人去樟子松的原产地对病因进行了调查。

过去我们和林业局一直没有任何关系，通过这次事件建立了联系，同时还请他们给我们介绍了林业局刚退休的优秀技术员侯喜先生，为我们以后的工作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我认为在工作中经常要有不同观点和想法的人去“掺沙子”。

人的想法是可以改变的

从浑源到灵丘的途中，我想起一件事。我们最早走这条路是在1993年5月。临出发时翻译来告诉大家：“从这儿往前是禁止拍摄的，请大家把照相机交给我保存。”

“不允许拍照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要收照相机呢？难道这么不信任我们吗？”我坚持自己的意见，终于使他们撤回了要求。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10年，我们的关系彻底发生了变化。除了改革开放的浪潮波及到地方的因素外，也可以说通过日常的密切交往，我们建立了新型关系，总之，我们的合作伙伴功不可没。

我曾经和阳高县一位管外事的公安干部发生过3次激烈的争吵。摄影家桥本是争吵的导火线。桥本把一个身穿中山装、上面挂满了毛泽东像章的小老头到处游说“继续革命”的场面摄入了镜头。估计小老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刺激，精神失常了。

随后那个公安干部找到我，说：“有过路人举报，请把那部分底片交出来。”我反驳说：“反转片在这里无法冲洗，再说，日本政府没有正确地进行历史教育，中国政府对此多次抗议，日本好多人连日中战争都不知道，更别提‘文化大革命’了。”

吉之岛工会第一次绿化合作团来访的时候，那个公安干部趁我不在时，将代表团成员召集到院子里宣布：“出了这个院子，一概不许照相。”这时我正好路过那里，顿时不干了：“如果你这样做，我们马上离开这个县，今后决不再来！”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平时做事小心谨

慎，但是一旦超越了忍耐限度，反而什么都不在乎了。

当时的翻译是王黎杰，翻译得更有分量，还加上了“此人说一不二”之类的话。最近，有个当时在场的人跟我说：“高见，你当时的脸好可怕啊。”



图：最初的时候就这样牵着孩子们的手在村子里转悠。我觉得这种形式的接触很重要。左侧为王黎杰（天镇县 1996年）

那个公安干部一时不知所措，我给了他一个台阶，说：“有问题我负责。”把事情糊弄过去了。作为外国人，尽管我负责的余地是有限的，但我会竭尽全力去这样做的。以后有好几次也是用这句话解决问题的。

后来朝日电视采访团到这个县采访的时候，据说那个公安干部又让把拍摄好的录像带交给他们保管。县里连放录像的设备也没有，这样做显然是在搞恶作剧。

如果长期这样下去肯定不会有好事，所以在一次见面时，我主动向他表示道歉，说“我也有过错”，还一起干了杯。酒过三巡之后，他甚至向我讲起自己的经历。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融洽。

只要绿化合作团一来这个县，他总是一路陪同，而且率先拿起铁锹种树。了解当初情况的司机小张看到这个情景便跑到我身边说：“高见你看，人的想法还是可以改变的。”紧接着小武也跑过来说：“那个公安拿着铁锹种树呢，人是可以改变的啊。”

已经尝够苦头的我走到关系依然紧张的天镇县一位公安干部的身边和他打招呼，他只回答了我一句话“少跟我套近乎”。唉，连让我靠近的机会都不给。

会吵架的人懂得吵架的火候

有人喜欢阅读我的《黄土高原来信》，理由之一就是“文章写得很好，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完全不认识我的人这么说倒有情可原，认识我的人看到这话，一定感到愕然。

在参加国际绿化推进中心举办的座谈会之后，我说了一句多余的话：“如果打算培养 NGO 人才的话，重要的是要教会他们吵架的方法”。我的说法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结果还被指名成了“讲师”，而且几年后竟然弄假成真。

在工作中我的一个切身体验是有的时候学会吵架要比友好相处更为重要。友好相处心情舒畅，自己也轻松；但和人吵架，不仅消耗能量，同时自己也会受伤。

但是，如果要想让植树造林成功，有些时候吵架是必须的。每当这时我总是这样鼓励自己，要不想干，干脆一走了之，要想继续干，就必须直言不讳。

在活动初期随同我一起来大同的翻译王黎杰告诉我：“刘怀光说‘我和高见关系很好，但有一件事我不能原谅高见。高见曾经骂我不是人’。我告诉他，高见不可能说这样的话”。刘怀光当时是大同市共青团委的副书记，我们合作事业的负责人。

我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曾经说过那样的话。后来终于想起来，大概是哪件事做得不顺畅时脱口说过“chikusyo^①”，旁边的翻译把它翻给刘怀光时说成“他说你不是人”。确实“chikusyo”这两个字换种说法是“不是人”。在相互之间还没有完全建立信任关系之前，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引出莫名其妙的结果。

因为有过诸如此类事情，所以开始的头4年，我一直采取克制态度，努力不去注意差的方面，只看好的一面。我感到自己体内潜藏着危险，沉积的精神疲劳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会爆发出来。在第五年的春天，我终于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这种转变，祁学峰和王萍也都说“从那时起高见变了”。

尽管我自己没有多大感觉，但别人的感受还是相当强烈的。有一次绿色地球网络的副代表有元干明先生也在场，他对我说：“高见你好敢说啊，真让人捏一把汗。”

历史和文化上存在的差异，即使说出来也有不理解的地方。如果不说彼此就更无法沟通了。我把自己的想法不加掩饰地说出来，对方的反应也就变得更加坦率了。我认为，在某一个阶段实现这种转换是必要的。

我年轻时气盛，一到吵架和争论时就想占上风。实际上最理想、最巧妙的吵架是，挠着脑袋告饶“我认输！”但结果却达到自己的目

^① 日文中有“畜生”“真气人”两种意思，但此处中文意为“真气人！”——译注

的。我恐怕来世才能达到这种境界。

我这么讲，祁学峰可能要说“是我们把懵懵懂懂的高见带出来了”。这也无所谓。建立了关系，彼此都会发生变化的。

被迫吵架

我觉得自己吵过不少架，但是始终坚持避免发生肢体冲撞，如果动手，我只有招架的份儿了。我这个人本来就讨厌别人在你面前盛气凌人，可是在中国，国家和政府是强者，平民百姓是弱势群体，让你看不惯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在北京站的入口处，我看到一个保安冲着我前面的一个农民模样儿的人嚷道：“掏出票来！”话音未落，脚已踢了过来。我气愤极了，可是毫无办法，我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讲……我恨自己，当时真想再也不来中国了。

1995年夏天，大阪青年会议所代表团来的时候由于人数太多，无法坐火车移动，便包租了从北京到大同的专机，回北京时我也顺便搭乘此机。位于怀仁县的大同机场原来是军用机场，由军队管理。在机场他们竟然要没收我宝贵的威士忌，原因是“瓶塞已打开，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我说：“你们拿两个杯子来，我先喝一口，然后你也尝一口确认一下。”他们不肯。我又说：“一个杯子也可以，如果你们非要没收，我就把它全喝光。”

当时的翻译是王黎杰，只有她做翻译时我才能够这样吵架。“这个人可是说一不二”。因为她又补充了这句话，威士忌就又回到了我的身边。不是还回来的，而是自己回来的。这还用说吗？威士忌当然是愿意让我喝它啦。

根据我的观察，大部分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欺软怕硬”。其实，这种倾向无论在哪儿对谁来说都一样，不过普遍认为日本人更是如此。

可悲的是这并不是误解。在日本国内，“不畏强者，帮助弱者”一词已成为死语。

一次从北京机场乘坐中国国内航班去上海时被蛮横地告知“你的座位被取消了”。不是我要取消的，也不是超量发售机票导致的，而是某些要人突然决定出差，通过内部走关系，结果另一些人就成了牺牲品。我碰见这种情况已不止一两次。

这时如果用只言片语的中国话去交涉，肯定不会有什么好果子，于是我就用起大阪方言，敲着柜台抗议，拿出一副强者的架势于是出来一个懂日文的人应对，这样我就一直处于优势了。

在绿化合作事业中，我起着协调中日双方的作用。但是社会形态完全不同导致双方存在分歧。日本是资本丰富，生产过剩，工业产品价格低廉，劳动力价格昂贵，而且不管对什么，要求的水平都很高。而大同农村与日本相反，资本匮乏，产品不足，工业产品价格高昂，劳动力廉价。

在日本有很多通过自动化节省劳动力的技术，但对大同没有用。当地更需要的是增加就业，扩大就业率，采取工作分摊制。当然扩大就业对现在的日本来说也是件好事，但却无法实现。把日本的标准拿到大同无疑过高，造成经费及其他方面的浪费。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专家和有能力领导应该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提出合适的方案，但我的能力无法满足这种期待。我的方法是，只有慢慢等待。如果用当地的方法能够成功，我就缄默不语。即使通过引进日本的做法能够提高10%的成活率，但要搭上器材和时间的话，也就失去了意义。其实事情也很简单，如果有的地方种下的树苗死了，第二年补种就可以了。

如果出现失败，正好是一个机会。我尽可能从根本上考虑，使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各种各样的技术改造也都集中在这种时候进行尝试。人在失败时都会自我反省，进行反思，这时最好和他们一起共商

对策。如果能想出更多走出失败的方法，肯定会受到对方的欢迎。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和他们一起正视失败。共同拥有失败的教训比共同分享成功更能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有难同当的意识。所谓“同犯意识”，尽管这种表述不太恰当。如果这时表现出“失败的是你们，跟我无关”的态度，就会彻底毁掉合作关系。

喝酒的教训

中国很多的地方的习惯是“烟酒不分家”，一个人喝酒是对同桌人的不尊重。如果你想喝酒，就要与周围的人干杯，和他们一起喝。说“干杯”，然后一饮而尽，再把杯子倒过来让对方看一看。如果还剩一点，就会被说成是“半心半意”，受到指责，要想证明你是“全心全意”，必须先干杯来证明。

按着中国的旧习惯，与其在会议上正经八百地谈，不如大家围着饭桌谈管用。旧习惯有其历史渊源，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当然吃饭时酒是不能少的。我和市里干部谈事的时候也经常采取这种形式。

我总是利用这些难得的机会拜托一些事情。但是让人不安的是，有时酒喝多了，对方就会把承诺给忘到脑后。为了避免出现这种事，我就将他们的军：“没有比喝酒时做出的承诺更神圣的了，如果不遵守承诺，就没有资格喝酒！”有一次我甚至要求对方把说的写在纸上，结果被祁学峰数落了一顿。

不过也确实有让我为难的事情。早期参加黄土高原绿化合作团的一些人被“干杯”搞得半死不活。有一个女学生因为能喝，午餐时遭遇轮番灌酒，一坐上回宿舍的车便不省人事瘫倒了。

不过近几年这种情况少多了，这个功劳要归于我。1994年的春天，为了讨论为小学校种杏树的事，我们走访了浑源县照壁村。访问刚退下来的前任党支部书记家的时候，一只看起来就很凶猛的狗狂吠

着向我冲来。趁主人使劲拉住狗的瞬间，我从他背后的小窄缝中挤进屋里。

我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又没有翻译跟着。语言不通时惟一的靠山就是酒了。“干杯！”当我把酒杯里的酒一口喝光时，同桌的农民们脸上都露出了笑容。一杯，一杯，又一杯。而且当时给我们斟酒的是脸上施着红粉的农家姑娘，如果你拒绝，周围的人就会跟着起哄：“你怎么一点也不给姑娘面子！”结果那次喝的酒远远超过以往。

当我起身时已经酩酊大醉。一出家门，我就走到猛犬旁猛地把它抱起来一个劲儿地转圈，嘴里还嚷嚷着“狗是我的老朋友”。在场的人都为我捏着一把汗，担心我被狗咬着。实际上我有驯服狗的绝招，但为了避免被人乱用，就不在此公开了。

我庆幸当时抱起来的是条狗，如果是抱住了年轻姑娘，那么无论是在当地，还是在日本，都会引起轩然大波。最近我有意识地离狗远一点，主要是因为大同还有狂犬病，而且时有发病。

自从“狗事件”以来（实际上还有一次失败的教训），我一喝酒，大同的合作伙伴就阻拦我，“不要紧吧，别再喝了”。因此，绿化合作团来的时候，很少再发生以前那样危险的事情了。

虽然不再抱狗了，但是最近一喝醉酒就开始骂人，开始侃大山，醉话连篇，而第二天忘个一干二净。可能是因为上了年纪的缘故吧。我一喝酒，小武就说：“侃大山倒还蛮有趣的，骂人就免了吧。”

2002年春天，在走访大同农村时有人看见我就说：“傻瓜、酒鬼。”让人这么说，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大家都这么说，我就有点纳闷了，因为比我更能喝、更傻的大有人在呀。

后来搞清楚了。原来《大同晚报》有一篇彩印的报道，标题是《我是傻瓜和酒鬼》。当时记者采访我时我已经喝醉了，说：“搞活动初期曾面临过很多困难，但是因为我傻，逃得太慢，所以只好留下来接着干。”但是再怎么着也不能把这作为大标题呀！唉，这也算是自作自

受吧。不过有趣的是，年底评比报道的 10 大人物时，我被选为第二名。当然我的“傻瓜、酒鬼”也给叫开了。

第二年是《大同晚报》创刊 10 周年纪念日，我又有幸当选为“10 年报刊 10 大人物”，本来是件光荣事，可这“我是傻瓜和酒鬼”的卖点怎么好到处跟人炫耀呢？

恋爱、结婚、育子

2002 年 4 月，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在北京举办了中日青年环境保护合作论坛，并安排了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的会见等一系列盛大庆典活动。因为不习惯，我感到有些疲劳。

在论坛上我做了如下的发言。

如果给我讲的内容起个题目，不妨叫做《恋爱、结婚、育子》吧。今年正值日中邦交正常化 30 周年，在这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大家谈论更多的是“友好”，举杯庆贺。回顾自己所走过的历程，感触颇深。我觉得“友好”和“恋爱”很相似，往往是在并不很了解对方的情况下产生了激情。不了解对方的缺点反而不错，只要双方心情都好的时候在一起就可以了。

可是种树养树就不同了。麻烦的是树是有生命的，一旦枯了就无法起死回生，因此来不得半点儿疏忽。培育树的过程很长，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也很枯燥乏味。如果希望它长得快点，拔苗助长又适得其反。那么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肯定是不行的。一年中有 4 个季节，必须不误时节地抓紧作业。就某项实验而言，有可能会因为瞬间的耽搁就得再等一年，所以是在和时间赛跑。

虽然和合作伙伴的关系非常重要，但对方并不一定是你的意中

人。因偶然的相遇或是别人的介绍认识了，但是在很多方面双方互相并不了解。对着镜子照照自己的脸，觉得自己也该有自知之明，应该有意识地努力去深入了解对方。不应该只了解对方好的地方，还应该相互了解对方的缺点，取长补短。越是在痛苦的时候越要相依为命、相互扶助。只有同甘共苦，双方的感情才会更深。

如果把“友好”比做恋爱，那么育树就好比维持婚后生活，养儿育女。热烈恋爱的结果会有孩子，即便有时是“计划生育”失败的结果，男女双方也已产生作为父母应履行的长期责任。种树也是一样，不能光种不管。尽管恋爱、结婚、育子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阶段，这一点我们必须意识到。

在我们实施的项目中，有的地方举行盛大的开工仪式，邀请政要出席，并建造了非常漂亮的纪念碑。这对烘托“友好”气氛虽然大有帮助，但是其中大部分种树本身却没有成功，令人不可思议，也可能是因为对不同的性质缺乏充分认识。从那以后，我要求所有的开工仪式都搞得简单些，纪念碑也修得小一些。

将来绿树成林是最高最好的纪念碑，其他的东西没有也无所谓。形式主义对绿化有百害而无一利。（中间省略）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干部多次来视察我们的合作项目点，日本政府和政府援助项目的有关人员也多次来过，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对双方的合作关系，很多人都说“真令人羡慕，你们是怎么建立起这种关系的？”林业厅的退休干部相马昭男先生在两年里和我一起在大同逗留了100天。他向前来参观的人介绍说“这个项目最可贵之处在于不仅把树种在了大地上，同时也种在了人们的心里”。我非常高兴。

我和直到昨天还在会场的祁学峰在一起工作了8年。我们像兄弟，更像夫妻，坦诚相见，真心实意。实际的工作都是大同的青年们做的，我也是他们教育出来的。应该表彰的是他（她）们，而不是我。

我出席昨天的表彰仪式，觉得很惭愧。今天也应该是他们站在讲坛上做报告。

工作开展初期频繁的人事变动令我非常头痛，但我现在仍然认为选择共青团作为合作伙伴非常好。一起在农村同吃同住的共青团干部在这 10 年里不断提升，成为县、区的领导干部，正是他们全力以赴地支持着我们的合作活动。

我讲的内容也许不太适合今天的场合，好像饭后又在酒馆里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时说的话。但这是我从经验得出的发自内心的感受。如果能对各位起到一点参考作用，我将感到非常荣幸。谢谢各位。

在实际发言中，我中间省略的内容有很多是让主持人提心吊胆的部分，大都是“作为异质分子‘掺沙子’”的内容。我的发言多次被掌声打断，能够得到中方与会者的支持，我非常高兴。会后很多人和我握手时都说我的发言很精彩。